

文史知识

读史与学文

东汉宦官和外戚的斗争

怎样做李商隐诗的「解人」

宋代四大书之一《太平御览》

经和经学

「支那」的本义是什么

唐 弢

何兹全

吴调公

戚志芬

汤志钧

陈启智

4

1983

WENSHI ZHISHI

文史知识

1983年第4期
(总第22期)

• 治学之道 •	读史与学文	唐 弢	3
	初学历史地理学必读书目	谭其骧	7
• 文学史百题 •	敦煌文学的民间风格	张锡厚	8
• 历史百题 •	东汉宦官和外戚的斗争	何兹全	14
怎样读	怎样做李商隐诗的“解人”	吴调公	20
	清代地方志的史料价值(下)	朱士嘉	27
明清档案在历史研究中的地位		韦庆远	32
• 文史书目答问 •	研究敦煌变文的重要参考书	柴剑虹	40
• 文史工具书介绍 •	宋代四大书之一《太平御览》	戚志芬	46
诗	《诗经·卫风·河广》浅析	程俊英	52
文	远托异国 昔人所悲——读《李陵答苏武书》	艺 舟	54
欣	以灵巧之笔抒写眷眷之情		
赏	——析李清照的《一剪梅》	郑孟彤	59
鸟鸣的联想和禽言诗		晁继周 陈杏珍	65
文化	寒食·清明	筱 雨	70
史	漫话“相扑”	伊永文	73
知识	清代“笔帖式”	杜家骥	76
经和经学		汤志钧	80

两汉时期的西域都护府	维 衍	85
------------	-----	----

人 物 春 秋	汉末女诗人蔡琰	陈祖美	90
	顾恺之和他的《列女传图》	洪丕谟	94
	慢词的开拓者柳永	李国庭	99
	抗金双杰——李纲和宗泽	施宣圆	105

• 古代民族志 •

彝、白族先民建立的政权——南诏	金 石	110
-----------------	-----	-----

成语 典故	灭此朝食	栗 村	114
	余音绕梁	郑 越	115

• 青年园地 •	樱花兼有梅花香——《源氏物语》与中国古代诗歌	
	内蒙伊盟师范青年教师	安 源 116

• 文史信箱 •	“支那”的本义是什么？	陈启智 119
----------	-------------	---------

• 文史研究动态 •

李商隐的无题诗和锦瑟诗讨论综述	陈冠明	122
-----------------	-----	-----

• 读者 • 作者 • 编者 •

关于“莫须有”释义的意见		127
--------------	--	-----

• 补白 5 则 •	颜之推论老而好学(19)	改名学艺(64)	呆若木鸡(69)
	于嘏子待友(79)	涅槃经变图(局部)介绍(89)	

顾恺之《列女图》(局部)	封二	涅槃经变图(局部)	封三
--------------	----	-----------	----

文史知识

1983年第4期

(总第22期)

• 治学之道 •	读史与学文	唐 弢	3
	初学历史地理学必读书目	谭其骧	7
• 文学史百题 •	敦煌文学的民间风格	张锡厚	8
• 历史百题 •	东汉宦官和外戚的斗争	何兹全	14
怎样读	怎样做李商隐诗的“解人”	吴调公	20
	清代地方志的史料价值(下)	朱士嘉	27
	明清档案在历史研究中的地位	韦庆远	32
• 文史书目答问 •	研究敦煌变文的重要参考书	柴剑虹	40
• 文史工具书介绍 •	宋代四大书之一《太平御览》	戚志芬	46
诗	《诗经·卫风·河广》浅析	程俊英	52
文	远托异国 昔人所悲——读《李陵答苏武书》	艺 丹	54
欣	以灵巧之笔抒写眷眷之情		
赏	——析李清照的《一剪梅》	郑孟彤	59
	鸟鸣的联想和禽言诗	晁继周 陈杏珍	65
文化	寒食·清明	筱 雨	70
史	漫话“相扑”	伊永文	73
知识	清代“笔帖式”	杜家骥	76
	经和经学	汤志钧	80

两汉时期的西域都护府	维 衍	85
------------	-----	----

人	汉末女诗人蔡琰	陈祖美	90
物	顾恺之和他的《列女传图》	洪丕谟	94
春	慢词的开拓者柳永	李国庭	99
秋	抗金双杰——李纲和宗泽	施宣圆	105

• 古代民族志 •

彝、白族先民建立的政权——南诏	金 石	110
-----------------	-----	-----

成语	灭此朝食	栗 村	114
典故	余音绕梁	郑 越	115

• 青年园地 • 樱花兼有梅花香——《源氏物语》与中国古代诗歌

内蒙伊盟师范青年教师	安 源	116
------------	-----	-----

• 文史信箱 • “支那”的本义是什么？	陈启智	119
----------------------	-----	-----

• 文史研究动态 •

李商隐的无题诗和锦瑟诗讨论综述	陈冠明	122
-----------------	-----	-----

• 读者 • 作者 • 编者 •

关于“莫须有”释义的意见	127
--------------	-----

• 补白 5 则 • 颜之推论老而好学(19)	改名学艺(64)	呆若木鸡(69)
于嗟子待友(79)	涅槃经变图(局部)介绍(89)	

顾恺之《列女图》(局部) 封二	涅槃经变图(局部) 封三
-----------------	--------------



读史与学文

唐 弢



唐弢，浙江镇海人，1913年生，是我国著名的作家、评论家、鲁迅研究家。曾任中国作协上海分会书记处书记，复旦大学、上海戏剧专科学校教授，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研所研究员、作协理事、鲁迅研究学会副会长。主要著作有《海山论集》、《创作漫谈》、《晦庵书话》等，辑录有《鲁迅全集补遗》、《鲁迅全集补遗续编》，主编有《中国现代文学史》。

我没有念过私塾，那时教育制度已经改革，实行的大概是壬子癸丑学制^①吧，现在也说不准确，但不会是光绪二十八年最初颁布的壬寅学制却可以肯定，全部学程分五个阶段：初小、高小、中学、预科、大学。初小有修身、国文、算术、手工、图画、唱歌、体操，到高小才加上理科、本国史地和读经。我也没有较多的读书的机会，从高小到初中，三易其校，读了四书中的两部：《论语》和《孟子》。

清代章实斋（学诚）说过：“六经皆史。”最初教我四书的老师把《孟子》看作文章轨范。认为这部书在四书中最有特点，笔墨酣畅，气势磅礴，可以从中学习作文的方法。在一定意义上说这是对的。后来我读到章实斋那句话，以及《文史通义》对桐城派的批评，觉得气势之类很空疏。桐城自称宗韩，而韩愈的文章又师承《孟子》，渊源分明，难怪有些人要对将它们串连起来，表示深深的不满了。

我没有去研究文章轨范，却很欣赏“六经皆史”这句话，以为这是

^① 壬子、癸丑为民国元、二年的干支年号，指辛亥革命后实行的新学制。

经过分析与思索的恰当的判断。但我又想，既然“六经皆史”，那么，读经课所教的后来列入十三经之内的这四书，不也正是历史吗？应当把《孟子》当作历史读，应当把《论语》当作历史读。从这个角度出发，我果然发现许多原先没有注意或者注意得不够的材料：生动，有趣，充满着社会生活的细节。譬如说“出疆载质”，它告诉我历史上“官迷”们奔走钻营的法门，“瞰亡往拜”，则又描出了官场酬应的勾心斗角，至于“是以君子远庖厨也”（《孟子·梁惠王》），那简直是装聋作哑，自欺欺人，昧着良心说瞎话了。然而这的确是历史——白纸黑字的活生生的历史，可以用来解释古书上许多没有解通的疑难。它们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我因此佩服章实斋的《文史通义》，也佩服同样是研究史学的唐代刘知几的《史通》，以为它们虽有缺点，却仍然不失为研究历史的名著，在往后的岁月里，一直是我时时翻读的两部书。

还有比这更重要的是，从那时开始，我对历史发生了兴趣。我在自修生活中一度舍哲学而就历史，后来又少写杂文去做编写文学史的准备，都和这点有关。1934年底，上海有家期刊征文，题目是：“1934年我所爱读的书籍”，我填了韦尔士的《世界文化史》，萧一山的《清代通史》，声明在所读的历史书籍中，还没有遇到心爱的书，比较可以看看的只有这两部。最近翻到这本期刊，回想当时，大概我已经以较多的时间和精力，开始在阅读历史了。

感谢鲁迅先生的关怀。我的答复在期刊上发表以后，同年4月19日，他在写给我的信里，把《清代通史》和他认为“还好”的夏曾佑《中国古代史》并论，但又指明：“大约萧一山的那一种，是说了一个大略的。”接着提出《清代文字狱档》那样的原始材料来。鲁迅先生是重视政治的。在这句话里，显然还保持着 he 慨叹“十足做了二百五十年奴隶，却换得这几页光荣的学术史”的基本观点，同时，也说明他不满于一般历史书只记概略，而不写丰富的社会生活内容的缺点。

就说我提到的那两部历史吧。萧一山专治清史，十九岁到北京，博览群籍，受知于新会梁任公（启超）。任公介绍他到清华教书。少年得志，睥睨一世。我推荐的《清代通史》，那时还只出版了上、中两卷，平心而论，在新编的历史书中，这算是资料丰富的一部。倒是韦

尔士的《世界文化史》，比起我稍后读到的伊冈·福利得尔(Egon Friedell)的《现代文化史》来，似乎逊色一点。后者从欧洲文艺复兴谈起，时间较短，材料集中，写来精辟周详，文采斐然，的确引起了我对历史的更加强烈的兴趣。

其实鲁迅先生的关怀也不是突如其来的，许多伟大人物都主张读史，他同样认为青年人应当读一点历史。我最初和他见面，向他请教自学方法，他学过马克思主义，却谦虚地说自己不懂理论而喜欢历史，如果有一点理论基础的话，也是从学习历史经验中得来的。因此，鲁迅先生也很注意执笔者的立场和观点，告诉我《唯物史观世界史教程》对初学者颇有好处：简单，明了，容易接受。我很想读这一类书，渴望从书里学习研究历史——乃至整个治学的方法，因为我知道方法论不单单是方法上的问题。可惜那时这部书还没有中译本，我又没有能力阅读原文，常常为这点而感到苦恼。

《文史通义》之外，我读得较多的是刘知几的《史通》。作者认为史学家应兼有“史才”、“史学”、“史识”三个长处，而以“史识”为最要，他还提出“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的主张。一个生活在一千三百年前封建统治时期的古人，能有这样见解，我觉得十分难得，虽然他的“史识”不一定就是我们今天说的立场和观点，但以客观的态度从众多的事实中选取自己所需要的材料，提要勾玄，去芜存精，总不免和执笔者的主观修养有关，那该是必然的吧。刘知几的最大毛病，看来也和章学诚一样，虽然立论妥帖，但到具体论述一部史书的时候，有时精辟，有时却流于诡辩。章学诚被讥为刑名师爷，刘知几写了《申左》，以袒护《左传》闻名，他指出这部编年体史书的许多好处，最后连缺点也说成优点，而对纪传体史书却多所责难，对中国第一部通史《史记》的开创性意义，不仅说得不够，相形之下，甚至有点不公允和不恰当，他走了偏锋。

《史记》有的材料采自《世本》，体例也有承袭《世本》的，这是大家公认的事实。不过司马迁还是采录公家文献，进行实地采访，对原有事例多所增益。在《陈涉世家》里敢于肯定群众起义的作用，依我看，主要是采访的时候听了民间的传说和叙述。“文惟恐其不出于己，

史惟恐其不出于人”，正是中国的传统。《史记》承用旧文，不事改饰，刘知几认为作者不过“整齐故事”，虽非毫无根据，却说得过分了一点。编年以时为纲，纪传以人为纲，司马迁着重经营的是人，通过人来表现事的衍变与发展，而我们觉得真实生动、富于文采的片段，也往往正在列传、世家那些篇章里。

由于司马迁的文才，中国古代文史不分的现象，到《史记》更为突出。这部历史名著同时也是一部文学名著。就文艺修养而言，在这之前，我已经读过诗，学过画、诗，一开始因为惑于“美人香草”之说，读的是王次回的《疑雨集》和《疑云集》，后来觉得他格调不高，转到唐人温（庭筠）、李（商隐）一派。但我不能忘情于清人黄仲则，一部《两当轩全集》常在手头。读了《史记》以后，文学的兴趣转向汉魏六朝，尤其喜欢曹孟德父亲和陶渊明，虽然抒发性的诗歌仍不免流于空疏，但就思想感情而言，从色彩到音调，都已褪去了象《都门秋思》诗那样的衰飒、忧郁与凄苦；而黄仲则艺术上的举重若轻，潇洒自如，直到今天，还使我感到惊异和佩服。

我的艺术感情的确起了很大的变化。

这个变化更大地表现在我对美术的关系上，我完全放弃了对中国画的学习，中止画画，使自己成为仅仅是美术的鉴赏者。我年轻时学过画，当初认识一位老画家，他是个回族，生性朴讷，态度和蔼，擅长山水画，是清末名画家陆廉夫的门人。我和他的儿子同学。星期天到他家，进门一阵寒暄，老人二话不讲，便从柜子里取出裁好了的一尺见方的高丽纸，一面展纸，一面磨墨，提起笔来作画，他全神贯注，伛着腰，嘴里“喏！喏！”地向我示意。我目不转睛的看定纸面，随着笔端的移动，有时出现一拳怪石，有时出现几株远树，格局简单，自成片段，一幅幅都是意趣盎然的速写。至于怎样皴，怎样点，运笔侧正，着墨浓淡，他从来不讲，只是“喏！喏！”地让我自己去观察，去思索。

但他是严肃的，一丝不苟。我要上去给他磨墨，他不许，给他添纸，他也不许，只是让我站在一旁，屏息静气地看他运笔。画完之后，我将这些带回住处，照样临摹，下次连同摹本一起送过去，他反

初学历史地理学必读书目

谭其骧

要学历史地理学，先得打好历史和地理两方面的基础。学中国历史地理，当然得先有一定的中国史知识，一定的中国地理知识，主要是自然地理方面的基础知识。这些方面的书我想读一些大学教材就行。

历史地理的专著，解放前出过几本讲疆域政区沿革的，有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疆域沿革史》(顾颉刚、史念海合著)，有开明书店出版的《中国疆域沿革略》(童书业著)等。解放后出版的，五十年代出版社出版的侯仁之主编的《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和最近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是比较合适的，质量比解放前高了许多。上述诸书，都可以阅读。

真正要做这方面的研究工作，还是得看古书。《读史方舆纪要》当然是一部好书，前几卷论历代州域形势，读后可了解历代疆域政区变革的概略，各省的总论，也写得好，这部书既可作初学入门必读之书，又可搁置案头随时备检。读《方舆纪要》当然还谈不上研究，要研究就非读各史地理志、唐宋总志、各史河渠志和水经注不可。单读这些地理书往往还是不能解决问题的，那就得再广泛搜集有关史料，有时还得通过实地考察，通过运用地理学的方法分析问题，才能取得良好成果。

复端详，一一为我指出不合格的地方。

可惜这样的日子不长，终于因为职业关系不得不停顿了，但我并没有中止学画，或者倒可以说更加用功些。我很喜欢王石谷(翬)。有正书局玻璃版印的画册买不起，又不知石谷有什么文字著作，只得找和他同时驰名的王原祁《雨窗随笔》、恽寿平《南田画跋》来读，后一书里果然有不少是题石谷山水的，而且引了两人之间论画的原话，我对“追踪先匠”、“直逼古人”之类没兴趣，只有一处，论及临摹古画，题跋说：“其最不同处，最多相合。李北海云：‘似我者病’，正以不同处同，



敦煌文学的民间风格

张锡厚

1900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总数达两万卷以上的敦煌遗书，这是二十世纪人类文化史上的大事。但是这些珍贵的敦煌遗书却大都被英、法、俄、日等国探险者劫藏到国外，很快又引起国际学术界的重视，随之产生以研究敦煌文物文献为对象的专门学科——敦煌学。而敦煌文学则是敦煌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内容除敦煌遗书内少数文人作品和某些专集、选集残卷外，大都是民间长期流传的通俗文学作品，主要包括歌辞、诗歌、变文、词文、话本小说、俗赋等多种文学样式。这些作品直接继承汉魏以来乐府民歌、小说杂赋和通俗诗歌的优良传统，比较广阔地反映出唐代社会现实和人情风貌，具有浓郁的民间气息，是研究唐代文学的重要方面。

敦煌文学主要扎根在深厚的民间土壤，其中一些通俗文学作品往往又是经过长期流传、不断加工润色而成的集体产物，没有留下作者的姓名，有着深深的民间烙印。尽管这些作品的表现形式还不够完善，艺术实践也很稚拙，但是，在选择题材、创作方法、运用语言等方面进行了勇敢的尝试，逐渐形成一种质直刚健、生动活泼的民间风格，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民间文学旺盛的艺术生命。

不似求似。”我觉得这段话很好，说出了临摹的要点。直到读了《史记》，才又将“摹巨然”、“师黄鹤山樵”等等根本否定。心里想：司马迁用文字写一部历史著作，尚且要游览天下名山大川，使文章有奇气；我画山水，怎能老是跟着古人，从书本讨生活，弄这些纸上烟云呢？我决定放弃学画，正如向古典诗歌吸取营养一样，也向艺术品——后来还加上西洋的：米开朗基罗、鲁本斯、伦勃朗、罗丹、马蒂斯和毕加索，汲取自己需要的东西，以培养感情与兴趣。我于是成为一个美术——不，应该说是艺术的鉴赏者。（题头篆刻 金昌一）

首先，作品题材的多样化。敦煌文学以粗犷的笔触在广阔的社会领域展现出人类生活与佛寺禅门的各个方面，不仅有现实社会的真实记录，人情世态的深切反映，也有佛国天堂的虚幻描绘和冥界地狱的恐怖场景。特别是某些韵文作品，或抨击时政、揭露矛盾，或感慨悲怀，触景兴叹，或怨思幽恨，悲愁萦绕，抑或是讥讽嘲弄、劝世警俗，都程度不同地触及到当时社会的弊端，进而开拓文学创作的社会领域。来自民间的敦煌歌辞，在反映社会现实、表现人民疾苦上更加直接坦率、真实有力，有一首反映唐代不合理的兵役制度和战争给人民造成灾难和痛苦的歌辞写道：

十四十五上战场，手执长枪。低头泪落悔吃粮，步步近刀枪。昨夜马惊辔断，惆怅无人遮拦（失调名）。

无独有偶，敦煌写本王梵志诗亦云：

相将归去来，阎浮不可停。妇人应重役，男子从征行。
带刀拟开煞，逢阵即相刑。将军马上死，兵灭地居营。
血流遍荒野，白骨在边庭。去马游残迹，空留纸上名。
关山千万里，影绝故乡城。生受刀光苦，意里极惶惶。

连续不断的边塞战争，名目繁多的赋税徭役，大大加重人民的负担，民间词人有的直辞揭露“每岁造寒衣，到头归不归”（《菩萨蛮》）的严酷现实，有的真实描绘“富者高眠醉梦中，贫者已向尘埃走”（《十二时》）的贫富不均的社会现象。尤为难得的是敦煌歌辞《酒泉子》还记载下黄巢起义队伍“惊御辇”、“犯皇宫”、“夺九重”的造反行动，该首歌辞把起义军威武雄壮的声势，和封建官僚丧魂失魄的丑态，描写得淋漓尽致：

每见惶惶，队队雄军惊御辇。蓦街穿巷犯皇宫，只拟夺九重。
长枪短剑如麻乱，争奈失计无投窜。金箱玉印自携将，任他乱芬芳。

而另外一些歌辞又能冲破封建阶级轻视妇女、玩侮女性的偏见，抒写出征妇情思、怨妇悲愤以及被侮辱、被损害女性的反抗心声。率

直地表达征妇“相思夜夜到边庭”(《茶怨春》)的痛苦,毫不掩饰“泪珠串滴,旋流枕上,无计恨征人”(失调名)的怨旷,另一方面又表达出“今世共你如鱼水,是前世姻缘……心穿石也穿,愁甚不团圆”(《送征衣》)的坚贞爱情。但是被迫沦入社会底层的妇女已完全丧失人的尊严,变成有闲阶级的玩物。有一首《望江南》大胆抒写受尽侮辱的妓女向冷酷现实发出的强烈控诉:“莫攀我,攀我太心偏。我是曲江临池柳,有人折了那人攀,恩爱一时间。”象这样满含悲愤的歌辞,已冲出唐代哀婉悱恻闺怨词的窄狭范围,直接为陷入不幸地位的妇女鸣不平。

敦煌歌辞还有描写商贾长途跋涉、追逐财利“富不归”、“贫不归”、“死不归”(《长相思》)的不同命运,表现儒士书生穷愁潦倒发誓“不朝天”(《浣溪沙》)的无比愤慨,以及反映渔夫豪侠、僧徒道士、磨面娘子、五陵年少、蕃汉将士等各种类型人物生活状态,思想情操的歌辞,大都内容充实,题材多样,殊堪一读。

同样,作为唐代新兴文体的敦煌变文在展现佛国世界和人间生活题材方面也有着丰富多彩、令人炫目的变化。《降魔变文》、《维摩诘经变文》、《破魔变》、《目连救母变文》等,主要以佛经神变故事为主,既有五彩缤纷、瑰丽神奇的佛天圣境,仪态端庄、雍容大态的如来佛祖,也有妖冶多姿、巧施媚态的邪道魔女,和阴森可怖、惨象迭现的冥界地狱,通过一些神秘莫测的争圣斗法的描写,使枯燥无味的经文教义逐渐故事化、形象化、艺术化,生动地展现出超现实的理想境界。《伍子胥变文》、《汉将王陵变文》、《王昭君变文》、《张义潮变文》等,则又是以历史故事、民间传说和现实斗争中英雄人物为内容。这类作品的出现,清楚地表明宗教徒狂想式的情节结构已无法使民众继续滞留在虚幻的幸福之中,反映世俗生活的悲欢离合,终究要战胜天国的信仰,揭示现实、歌颂人物重视变文的劝善惩恶的进步主张,远远超过佛陀变文的善恶罪福观念。从伍子胥之类变文又可看到作者对正直善良反遭迫害人物的同情,并热烈赞扬他们反抗强暴统治的高贵品质;积极颂扬陷入厄运而毫不退缩、忠贞刚毅的善良女性;大力表彰爱国将士维护祖国统一的英雄行为;同时猛烈抨击丑恶的社会现象和残暴荒淫的封建统治者。这类变文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出人民爱憎分明的态度,

具有强烈的批判精神，深受人们的欢迎和喜爱。

敦煌文学无论是歌辞、变文还是其他文学样式，大都能利用广阔的社会题材和奇妙构想，或详或略地描绘出上自帝王将相，下至僧徒小民一大批性格鲜明、真实生动的人物形象，从而使敦煌文学的人物描写日趋社会化和多样化，表现出丰富的民间性。

其次，创作方法的浪漫化。敦煌文学的源泉主要来自民间的深厚土壤，自然容易接受民间艺人丰富想象力的影响，因此某些作品在探索生活真实的同时，又能大胆运用具有浓厚浪漫色彩的艺术手法，使得某些超现实的想象、夸张呈现出晶光耀目的理想境界，却又比较接近世俗社会的生活真实和人物的性格逻辑，以强烈的美与丑、善与恶的艺术力量冲刷着人类社会的污泥浊水。

以佛经神变故事为题材的敦煌变文，充分利用奇特的设想，惊人的夸张，让想象的翅膀遨游在天上地下虚无缥缈的玄怪世界，描绘出一幕幕佛国天堂和冥界地狱的奇异场景。《维摩诘经变文》虽是演绎《维摩诘经》“维摩居士生病，佛派人问疾”的故事，但经变文作者的艺术加工后，十几个字的经文有时竟被铺衍成三、五千字的长篇，设想出众多的人物，安排下奇妙的情节，穿插着动人的故事，详细描写富丽堂皇的佛天圣境，以及弥勒菩萨、光严童子、持世上人、文殊菩萨等不同人物在问疾过程中的心理活动和变化过程，环环相扣，错落有致，使人读起来犹如步入奇妙的世界，颇耐人寻味。如果剔除其中佛家禅理的说教，就不失为后代神魔小说的雏形。《目连救母变文》则以粗犷的笔触不断展现冥间地狱的残酷刑罚和阴森可怖的场面，同时又塑造一个上穷碧落、下至黄泉，为救生母出地狱，而甘冒一切险阻的目连形象，也很成功。

至于敦煌变文运用神佛斗法、变幻替身，腾云驾雾、呼风唤雨等高度夸张的艺术描写，已把志怪小说的传统手法同民间传说的丰富想象巧妙地揉合在一起。如《维摩诘经变文》描摩诸天人众“广现神通”时写道：“更有三头八臂，五眼六通……呼吸毒气，鼓击狂风，得海底之沙飞，使天边之雾卷。掷昆仑山于背上，纳沧海于腹中”。《破魔变》亦云：“更有飞天之鬼，异貌奇形，或五眼六牙，三身八臂，九口十

头。”这类变化万千的奇异化身逐渐把人们引入一个神秘莫测的世界。我们再看敦煌变文显现的“能大”、“能小”的变化，更有骇人听闻、出人意料之妙：“现大身周遍世界，或现小身微尘之内藏形”；“腾身直上，踊在虚空，高七多罗树，头上出火，足下出水。或现大身，侧塞虚空，或现小身，犹如芥子”（《降魔变文》）。当舍利弗变成金刚、狮子、鸟王先后斗败六师幻化的宝山、水牛、毒龙等相生相克的神奇变现，越发使人叹为观止（同前）。大概只有《西游记》中浪漫主义的描写才可与之媲美，可见这类反映劳动人民善良愿望和美好理想的浪漫精神，敦煌文学已得到初步表现，并为后代神怪题材小说的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与此同时，敦煌文学在进行客观描写的过程中，还十分注意吸取和运用表达人民意愿的民间传说，使作品涂抹上一层富有理想色彩的浪漫氛围，显现出生动的民间性。《叶净能话》为了表现道教法术的高强，便设想出智斩妖狐、惩治岳神、妙采仙药、观赏蜀灯、畅游月宫等变化无穷的艺术场景，突出描写叶净能“造化能移则移，乾坤要止则止”、“世上无二”的人物形象。至于其他篇中的浪漫化情节也写得生动感人，诸如“山神造寺，潭龙听经”（《庐山远公话》）；“摸马举鞍，便升云雾”（《韩擒虎话本》）；“死则同坟，幻化复仇”（《韩朋赋》）以及《燕子赋》、《茶酒论》等“拟人问答”，也常常借助想象表达人们对不同情事的爱憎分明态度，使敦煌文学的民间风格得到进一步的表现。

最后，敦煌文学的民间风格还表现在语言通俗化上。敦煌文学的作者大都是长期生活在民间，历尽沧桑、饱尝忧患的僧俗人士，他们在同人民接触和联系过程中，逐渐引起思想上的共鸣，对民间口头语言有更多的了解，因而在创作时才有可能大量地吸取口语俚词，为文学语言通俗化作出了一定的努力。

敦煌歌辞除去部分文人创作或明显经过文人加工的歌辞还沿用纤细绮靡的文风外，大都以简洁炼达的通俗语言，和近似白描的艺术手法，在遣词炼句、写景造意等方面，表露出浓郁的乡土气息。如写时光流逝：“春去春来春复春，寒暑来频。月生月尽月还新，又被老催人”（《杨柳枝》）；写舟船行进：“看山恰似走来迎，仔细看山山不动，是船行”（《浣溪沙》）；写远客思归：“独坐更深入寂寂，忆念家乡，路远关山

隔。寒雁飞来无消息，教儿牵断心肠忆”（《雀踏枝》）写态度坚决：“枕前发尽千般愿，要休且待青山烂。水面上秤锤，直待黄河彻底枯”（《菩萨蛮》）。这些词句几乎都是不加雕饰，信口信手拈出，既浅显易懂，又充满诗情画意。

以王梵志为代表的敦煌诗歌在追求语言通俗化道路上又迈出可喜的一步，创造出浅切平易、不同凡响的通俗诗风，如诗中写道：

他家笑吾贫，吾贫极快乐。无牛亦无马，不愁贼抄掠。
你富户役高，差科并用却。吾无呼唤处，饱吃长展脚。
你富披锦袍，寻常被缠缚。穿苦无烦恼，草衣随体着。

我昔未生时，冥冥无所知。天公强生我，生我复何为？
无衣使我寒，无食使我饥。还你天公我，还我未生时。

这些诗篇既明白如话，通俗易懂，又言近旨远，发人深思，表现出诗人追求“直言时事，不浪虚谈”，“不守经典，皆陈俗语”（斯·七七八王梵志诗集原序）的倾向，从而冲破正统诗派的条条框框，抒写出浅切平易的五言通俗诗，为唐诗及后代诗歌通俗化作出了生动的榜样。

此外，敦煌变文、话本小说等民间说唱文学虽受四六骈语的影响，但已较多地使用浅近的文言和简洁明快的口语，如《伍子胥变文》已经出现比较稚拙的白话散文。到晚唐的《张议潮变文》、《张淮深变文》则更为普遍地运用单句散行、流畅口语，初步取代习见的骈文形式。特别是敦煌话本小说更着重于散文叙写，为适应社会各阶层人士的需要，招徕更多的听众，对语言的选择和使用也更注意口语化，即使还残存一些文言骈语，对仗也不那么严格工整，逐渐向浅切简朴，精炼畅达的方向转化，创造一种适于讲说的文白兼用、通俗易懂的文学语言，为后代话本小说的繁荣开辟了新的途径。

敦煌文学在我国文学史上享有一定的地位。它那清新质直的民间风格，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后代诗词、小说和戏曲文学的发展，值得我们重视。

（题头篆刻 戴山青）



东汉宦官和外戚的斗争

何 兹 全

在中国历史上，宦官干扰政治的事，几乎是和王权、皇权的存在共始终的。秦以前不说，就从秦开始直到明清，几乎没有一个王朝或皇朝没有宦官弄权问题。

就东汉来说，宦官政治活动的特点是它和外戚的斗争，这是其他皇朝所没有的。这是东汉历史的具体条件所决定的。

东汉宦官、外戚间的斗争，从和帝时开始，一直斗到东汉末年灵帝时止。灵帝死后，宦官杀了外戚何进，豪族袁绍起来把宦官一网打尽，斗争才告结束。

这个长时期的宦官外戚斗争，大体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从和帝到桓帝初是第一个阶段。在这一阶段，外戚占优势。桓帝到灵帝死，是第二阶段。这一阶段，宦官先占优势，但最后却是彻底失败。

在第一阶段中，宦官外戚有四次显著的大斗争。第一次是宦官协助和帝同外戚窦宪的斗争。窦宪是章帝窦皇后的哥哥。和帝立，窦后为皇太后，窦宪以皇太后之兄的身份为大将军辅政，一门兄弟子侄都作大官，食封邑，还领禁兵典宿卫。地方刺史、守、令多出其门，官僚士大夫也多依附窦宪，象《汉书》作者班固就是窦宪幕府中的人物。

象窦宪这样一位权臣，当然会和皇帝发生冲突的。永元三年（公元91年），窦宪征匈奴，大胜还朝。据说，这时窦家有人阴谋杀害和帝。和帝就和宦官郑众合谋诛宪。《后汉书·宦者列传·郑众传》说：“时窦太后秉政，后兄大将军宪等并窃威权，朝臣上下莫不附之，而众独一心王室，不事豪党。帝亲信焉。及宪兄弟图作不轨，众遂首谋诛之。”窦宪死后，郑众以功迁大长秋，自是常参与政事。这是宦官外戚